

龔自珍詩文選注



13.71
107

龚自珍诗文选注

广州合金钢厂 广东省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广东师范学院
龚自珍诗文注释组



龚自珍诗文选注

广州合金钢厂 广东省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广东师范学院

龚自珍诗文注释组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189,000字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11-23 定价 0.67元

前 言

龚自珍是我国封建社会解体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爱国主义者和著名文学家。他继承历代法家的革新传统，揭露当时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倡导革新，成为近代变法运动的前驱之一。

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年——一八四一年），字璣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在清朝政府中长期充当内阁中书、礼部主客司主事、宗人府主事等京官。由于他尊法反儒，提倡“更法”，主张禁烟，反对殖民主义侵略，一直受到官僚大地主顽固派、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最后被迫辞官，死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年五十岁。

在龚自珍生活的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正在迅速没落，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重新高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发展，商民罢市，手工业者拆毁公堂，聚众抗官，接连发生。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革命洪流，猛烈冲

击着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活动，它们的经济掠夺和偷运鸦片，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推动和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这个时期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揭露批判还是粉饰维护；对外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是抵御抗击还是妥协投降。它的实质是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的斗争。龚自珍就是这个时期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地主阶级革新派。

龚自珍同顽固派、投降派的斗争是以诗文为主要武器的。他从“礼乐必相应”，即一定的政治必有相应的文化这一思想出发，根据事物都在变化的观点，提出“文体五百岁一变”，反对伪体，反对“剽掠脱误，摹拟颠倒”，“万喙相因”的文章。他针对当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尖锐地提出：“万幸之波濤，文章天然好”，“学徒不屑谈贾孔（贾公彦、孔颖达），文体不甚宗韩欧（韩愈、欧阳修）。”他提倡“尊情”，强调诗歌要表现诗人的个性，与儒家文人鼓吹文学要“明道义，维风俗”的谬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诗文，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笔锋犀利，有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的热烈追求，既继承了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晚年的爱国主义篇章和

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内容广泛，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影响尤大。这些诗文，是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其中有一些隐晦曲折，比较难懂，那是他对付清王朝文化高压政策的一种战术，只要联系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能透过文字上的烟幕来把握其真实思想的。

社会批判思想和更法主张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在这首洋溢着斗争精神的著名诗篇中，强烈要求改变“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渴望生气勃勃的未来。他为此大喊大叫了一生。

龚自珍是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走上社会批判的道路的。在他出生后几年间，给清朝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的苗民起义和白莲教农民起义相继爆发。一八一三年，天理教农民起义队伍袭击皇宫，嘉庆皇帝颙琰惊叫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二十多岁的青年龚自珍，从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中，看到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认为地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必须“更法”、“改图”，进行改革。他最早的政治论文《明良论》，正是对这次事件后嘉庆维护专制统治的“上谕”的大胆反驳。

在《明良论》、《尊隐》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龚自珍指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

“衰世”，并把它形象地描绘为一朵快要凋谢的、比枯木还要憔悴的花，这是对当时反动儒生吹嘘所谓“国家升平”、“天下恬然”的论调的有力驳斥。他还对寡廉鲜耻，“尽奄然而无生气”的封建士大夫，“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的大官僚、大贵族，以至“摧锄天下人材”的科举考试制度等等，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特别可贵的是，他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采用孔丘的愚民政策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指出当时官员的不“知耻”，正是皇帝把臣子当作犬马对待的直接结果，批判锋芒直指皇帝。

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员，龚自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乱亦竟不远矣”，公开提出“一姓不再产圣”，预言将有“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山中之民”兴起，取代京师腐朽的力量。另方面，他又说什么“天何必不乐一姓”，“鬼何必不享一姓”，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清王朝的“自改革”。当然，他所尊敬和赞扬的新兴力量——“山中之民”，不可能是指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农民和会党群众，而是指在野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和同情革新派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地主阶级革新派来代替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统治，在龚自珍那个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尽管如此，龚自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批判和对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的热情期待，终于不能不促使人们“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前方，直到几十年

后，还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某些代表人物读了“若受电然”，对他们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龚自珍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提出了革新的主张。他在《平均篇》等文章中，认为社会财富不均，是王朝“衰世”的表征和根源，指出土地的大量集中和财富分配的“大不相齐”，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引起了将使地主阶级“丧天下”的社会危机。因而，他提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主张在统治阶级内部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和进行财产再分配。这显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后，在地主阶级革新派头脑中引起的反响。尽管龚自珍主张的平均财富和起义农民“均贫富”、“均田”的口号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毕竟是接触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他重视土地问题，反对土地兼并，迈开了社会改革的步伐。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其进步意义在于反映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他出生并活动在资本主义萌芽较发达的江、浙地区，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有所影响。总的说来，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还是比较微弱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有所发展。早年写的《农宗》虽已提出“贵智贵力”，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和劳力来发展农业生产，反映了农业经营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全文封建宗法色彩十分浓厚。到他晚年的诗文里，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就较为明显，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了。如在《陆彦

若所著书序》中，他肯定了“天下之大富必任土”，认为可以通过土地的自由经营、雇佣劳动、发展商品生产来扩大财富。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他认为“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把保护和发展棉花蚕桑业提到“富国”的高度来认识。在《己亥杂诗》里，他还提出了在华北种桑养蚕，扩大国内丝织业生产和自铸“饼金”以抵御洋钱的输入等主张。这在客观上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与此相适应，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极权统治，否定“君权神授”；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反对妇女缠足；还在《病梅馆记》等文中隐约地提倡个性解放；这些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自觉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突破封建专制主义桎梏的迫切要求。

龚自珍同官僚大地主顽固派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同衰亡中的封建主义相互斗争这一时代内容。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龚自珍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到了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日落西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中的共产主义同衰亡中的资本主义激烈斗争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和龚自珍时代的斗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

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

龚自珍的革新思想是和他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密切结合的。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老沙皇在我国东北、西北边疆加紧侵犯，妄图扩大掠夺我国领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以武力为后盾，在我东南沿海一带，用鸦片紧叩我国的大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龚自珍正是带着坚决抗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这一时代使命跨进近代史开端的。他还在青年时期，就热烈探讨“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西北边疆和海防地理。他注意到十七世纪以来沙俄蚕食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移民西北，充实边防的具体建议，这对防御沙俄侵略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他又敏锐地指出英国殖民者“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揭露他们“环伺澳门，以窥禺服”的侵略野心。龚自珍对殖民主义者的奸诈、贪婪特性的认识，在当时来说不愧为卓越的见解。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紧对我国的鸦片走私，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围绕着禁烟问题，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林则徐等为代表，主张严

禁鸦片，而从鸦片走私中受贿敛财的穆彰阿、琦善等官僚大地主顽固派，却公然充当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抛出向外国侵略者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鼓吹“弛禁”鸦片。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斗争不断高涨。一八三八年广州就爆发了万人包围“洋馆”的群众大示威。人民群众英勇的反侵略斗争，增强了严禁派的决心。龚自珍看到了鸦片走私造成“遂瘠南东，丧金万万”，白银大量外流，东南富饶地区陷于贫困的严重后果，痛感殖民主义侵略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危机，于是坚定地站到林则徐等地主阶级严禁派一边，一直主张禁烟。早在一八一六年，他就斥鸦片为“食妖”，以后又提出要对种植鸦片的人，处以“梟其首于陇，没其三族为奴”的严刑。对庇护鸦片走私和吸食鸦片的官员，龚自珍尤其憎恶，曾在诗歌中予以辛辣的讽刺，对他们烟瘾发作的丑态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写，并且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禁烟”法令的虚伪性，痛斥顽固派庇护鸦片走私以致鸦片愈“禁”愈多的罪行。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曾想随同南下，参加禁烟斗争，未能实现。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提出了有关禁烟的十项建议，集中表现了他的禁烟思想，文中痛骂那些破坏禁烟的官僚和儒生是“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主张“杀一儆百”，充分反映了他禁烟的决心和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精神。

在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上，龚自珍和官僚大地主顽

固派也是截然相反的。他认识到坚决禁烟必然会引起英国侵略者和奸商的破坏和捣乱，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对付殖民主义强盗，所以他毅然驳斥顽固派所谓以“仁”治烟、“必毋用兵”的叫嚣，向林则徐指出禁烟斗争“无武力何以胜也”，建议林则徐到广东“宜以重兵自随”，“多带巧匠”、“修整军器”，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他还针对顽固派的诬蔑，严正申明为禁烟而“用兵”完全是正义的自卫行动，绝不是什么“开边衅”。鸦片战争爆发后，龚自珍义愤填膺，坚决主张抗战。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要去共筹抗英的大计。这同顽固派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惊慌失措，屈辱投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反对顽固派的投降主义的斗争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皇帝。因此，当道光皇帝由支持禁烟转到反对禁烟，公开采取投降主义路线以后，他们的斗争就日益艰苦并终于走向失败。一八三八年，龚自珍被迫辞官，他在“钟簴苍凉行色晚”的归程中，对禁烟斗争的前途就满怀忧惧，深深怀念“侧立南天”的战友林则徐，写下了“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的悲愤诗句。一八四〇年秋天，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投降派开始全面得势。由于清王朝反动统治者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回顾近代史开端时期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

斗争这一页历史，不但可以看到龚自珍等地主阶级革新派难能可贵的反对投降主义的爱国立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投降派和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危害性，并且从中吸取同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教训，积极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认识今天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深远意义。

为革新路线服务的尊法反儒精神

一定的思想路线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龚自珍一生坚持尊法反儒，这就为他的革新、爱国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时，迅速走向衰亡的清朝专制统治把孔孟之道当作救命草，大力鼓吹复辟倒退的儒家思想。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形成了“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的思想统治局面。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顽固派抛出孔丘的“克己复礼”，叫嚷“立法创自祖宗，百余年奉行勿替”，拚命反对任何改革。反动儒学是妨碍人们起来改造世界的精神枷锁。因此，要革新，就必须反儒。孔孟之道同时又是顽固派卖国投降的理论根据。他们把孔丘的“忠信笃敬行于蛮夷”来作为清朝对外的总方针。明明是纵容鸦片走私，他们却硬说这是“圣朝宽大”和以“仁”治烟；明明是向英国侵略者屈膝投

降，却被美化为“解仇通好”和“诚信化敌”。因此，要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就非批判儒家的卖国主义不可。

龚自珍出生于所谓“书香门第”，曾长期受到儒家经学的影响，在他走向反儒道路的过程中又遇到顽固派的压力和一些友人的劝阻，但是，革新和爱国要求使他终于冲决了儒学的罗网，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儒学是“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儒生是“缚草为形，实之腐肉”的僵尸，是一群反对新生事物，“坐谈性命”，“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的顽固派。他还对儒家的“独尊”地位提出大胆的挑战，指出：“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儒家这个在“九流”中很不光彩的学派，其“独尊”地位完全是后世反动统治者的提倡造成的。这些批判表现了他对儒家反动路线的强烈憎恨。

在独尊儒学的历史条件下公然打出尊法的旗帜，这是龚自珍反儒思想的特点。在反动儒生为了反对革新而掀起诋毁历代法家人物的阵阵恶风中，龚自珍却公开赞美历代法家。他继承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尊法思想，充分肯定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对汉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唐朝反对藩镇割据，以及清初镇压吴三桂、耿精忠等的分裂叛乱，都给予热情的赞扬。龚自珍特别推崇王安石。他年青时九次手抄王安石提倡变法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到三十八岁参加殿试，又继承这篇文章的精神，写成《对策》，阐述自己

的更法主张。他还继承王安石“三不足”的思想，提出不畏“大言”、“细言”、“浮言”和“挟言”的“四不畏”思想，并且不顾顽固派的攻击和污蔑，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这两句诗正好表明了龚自珍和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龚自珍尊法反儒，是和他倡导革新、反对侵略的思想密切结合的。他继承法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思想，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并且断言，凡是“拘一祖之法”的，必定自取灭亡，这是对儒家反对革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猛烈冲击。他发扬法家的法治精神，强调“刑乱邦用重典”，否定顽固派那一套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主张严禁鸦片和武力抵抗侵略。在《“葛伯仇饷”解》一文中，他有力地揭露了儒家“亚圣”孟轲歪曲事实，宣扬“仁政”的卑劣手段，这也就有利于揭露侵略者的伪善，唤醒人们对殖民主义侵略的警惕。

从龚自珍尊法反儒精神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史上尊儒和反儒、守旧和革新的斗争，常常是围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主要的矛盾而展开的。儒家思想不但是复辟倒退之道，也完全成为投降卖国之道。所有的卖国贼，从穆彰阿、曾国藩到袁世凯、蒋介石，从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直到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妄图使我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林彪，都无不大肆贩卖孔孟之道，乞灵于孔孟之道，从那里找寻毒害人

民、破坏革命、卖国投降的依据。孔孟之道成为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因此，我们要总结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投降卖国的孔孟之道，批判投降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

*

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革新派，龚自珍的思想充满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的时代，封建生产关系还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虽有所成长，资产阶级却还未产生，这使他不可能成为新兴阶级的代表，不可能跳越地主阶级的藩篱。他有很高的革新热情，可是又害怕农民的革命风暴；他强烈要求“更法”，却畏惧“劲改革”，认为法“可以更，不可以骤”；他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却又认为“权不重则民不畏”，主张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因此，他虽然热烈期待着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风雷的到来，可是，他的阶级偏见，却使他无法理解真正的风雷只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从而他所期望的未来，只能是一团虚无缥缈的疑云。他找不到出路，有时竟然从佛教虚无主义中寻找归宿，这是没有找到新的阶级力量的革新人物必然的悲剧结局。

龚自珍的尊法反儒也是不彻底的。他曾勇敢地反击尊经崇儒，但是却不敢直接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曾继承荀况、王充等法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批判儒

家的天命论，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作过有力的冲击，但是他自己又承认有意志的“天”，并在人性问题上抱有佛教唯心主义的观点。这都表明了他在反儒的某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动摇，还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尽管如此，龚自珍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那些愤激沉郁、震荡人心的诗文，象黑夜中的隐隐雷声，预示着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并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承认“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承认他们自己“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而地主阶级顽固派张之洞则破口大骂龚自珍的思想有“伤名教”，造成“父仇子劫”的后果，并发出“伤哉”的哀叹。这一褒一贬，正好说明龚自珍思想在我国近代史上“开一代风气”的进步意义。